

改革開放初期的年輕人

翁和義

一 巨輪轉向

人們通常將1978年底結束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這意味着中國走出了毛澤東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回顧自新中國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儘管中國在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和科研領域諸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在意識形態指導下進行的社會實驗和制度探索是不成功的，以消滅私有制為方向的農村集體化和城市工商業全盤公有化所產生的嚴重負面效果，在黨內和知識界引發了不同意見的爭論，而這些爭論又被不適當地定性為兩個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進而導致了為期十年的文革浩劫，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從上至下，由官員到百姓，普遍感到窮了、怕了、煩了。所以毛澤東去世後僅一個月，華國鋒抓了江青、張春橋這幾個人，居然舉國歡騰，喜極而泣，自發遊行，鞭炮如雷，形同第二次解放，彰顯人心向背！

老路已經走不下去了，苦頭吃夠了，出路何在？是在過去的做法上打些補丁呢，還是換一個活法，選擇新的方向？全黨全民都在思考。這時候，有三件事已着手在做，既是自然生發，也是不得不做。

第一件事是睜開眼睛看世界。近三十年中國關起門來內鬥，自詡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肩負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歷史使命，那麼此時資本主義世界究竟是甚麼狀況？應該去看看。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副總理谷牧率領六位省部級官員和六位司局級官員，到西歐五國（法國、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考察了三十多天，全團上下，極為震驚。那兒沒有腐朽垂死的迹象，在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諸方面，遠比中國為小，可借鑒、利用、合作之處甚多，回來立即向中央作了匯報。匯報會從下午3點半開到晚上11點，七個半

鐘頭，生動、熱烈。葉劍英明確講：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和過剩資金，聶榮臻更乾脆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討論了。」

1979年，廣東省委給中央呈送了〈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福建省委給中央呈送了〈關於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快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兩省建議準備劃出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先幹起來。這幾塊地方應當如何命名？鄧小平一錘定音：「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甚麼是對外開放？就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開放。從那時起，由擴大對外貿易到引進資金、技術、管理、人才，到開辦四個特區，允許外商合資、獨資辦企業，先開窗戶後開門，再掀屋頂，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全方位開放。開放導致人們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潛移默化地改變，進而導致中國社會發生了難以逆轉的嶄新變化。

第二件事是總結教訓。1949年中央進北京之前駐地在西柏坡，不少民主人士去那兒拜望毛澤東。有人問：何以共產黨以弱勝強，三年時間即以摧枯拉朽之勢取得壓倒性勝利？毛沉思片刻後說：「我們共產黨人是靠總結教訓吃飯的！」

1980年初，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提出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對領導人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不准許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義縱容、暗示、誘使、命令或強迫下級說假話。顯然，沒有對以往錯誤、教訓的深刻反思和否定，中國根本不可能走向改革開放。

第三件事是思想解放，即開展一場由黨內推及整個社會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文革剛結束，人們頭上還套着金箍，耳邊時時響起緊箍咒：「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不推翻，文革就否定不了，新的道路、新的方向就沒辦法探索，甚至都無法思考。

這場聲勢浩大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明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整個黨的工作路線、黨的工作態度，回到「實事求是」這四個字上來，也使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有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看來，一個新時代的開啟，總是伴隨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和大規模的思想解放，並以此為前提。

一是了解外部世界、二是總結歷史教訓、三是強調思想解放，促使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在思考一件事：共產黨搞革命究竟是為了甚麼？打了幾十年仗，死了幾百萬人，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政權。三十年過去了，很多地方農村的人還解決不了溫飽，城裏人的糧食還要定量供應，做衣服還要憑布票，整個社會處於物資極度匱乏狀態；人們不敢說話，沒有安全感。那麼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奮鬥究竟是為了甚麼？很多共產黨官員回想起當年參加革命，跟

共產黨走，有的是要分到土地、過上好日子；有的是為尋求公道，爭民主自由。可是，今日之情景，絕非當年之所願，這個狀況必須改變。由此，在當時的中央最高決策層和不同級別的官員中逐步形成了一個共識：共產黨要想繼續穩住政權，第一，要發展經濟，讓老百姓吃飽飯，過上好日子；第二，自己內部不能再亂鬥，不能再對不同意見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了，有句得人心的話叫「不折騰了」。共產黨上下有了這個共識，有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思考和處理事務的方法上就發生了悄然變化，改革也就應運而生了。

甚麼是改革？改革就是改掉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壓抑勞動者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理念、規章、制度和辦法。

首先冒出來，擺在縣、地、省和中央面前的問題是文革結束後，政治管控放鬆，一些地方的農民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即所謂的分田單幹。這種嘗試不是新事物，上個世紀60年代，由於急切躁進和浪漫色彩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導致經濟崩潰，餓死很多人，安徽等地就曾有組織地實行過「分田自救」以解決渡荒問題。這種方式在以往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資本主義的回潮，受到嚴厲批判和糾正。那麼現在允不允許，讓不讓搞？官員隊伍裏有很大分歧。畢竟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還很嚇人，心有餘悸的官員認為，再窮再苦，方向不能錯，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

但現在有了另一種思維角度：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直致力於把農民綁起來，採取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強制農民往集體化道路上走，而且愈走愈急，愈走愈快，原來計劃十五年完成的合作化，三年就完成了。接着馬不停蹄，又興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全民煉鋼鐵，糧食畝產放衛星，舉國說昏話，黨報居然登出畝產12萬斤的消息。一畝地666平方米，相當於每平方米產糧180斤，人扛着180斤的麻袋都站不穩，稻稈麥稈怎能撐得住？最後，食堂解散了，餓死幾千萬人。那麼，這次是不是可以不跟農民的心思和意願對着幹，讓他們試一試，至少在一些革命老區、窮困地區、邊遠地區、農民吃不飽飯的地區，允許農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產自救，先解決吃飯問題，然後再做引導？

安徽有個萬里、四川有個趙紫陽、內蒙古有個周惠，這些黨內有良知、思想開明的高級官員，開了個口子，讓農民先走幾步，先幹幾年。這一試之下，絕大多數



筆者攝於山西石樓縣黃河九曲環繞處。(圖片由翁永曦提供)

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也就是過去年年要國家返銷糧食給他們的地方，居然當年增產，第二年賣餘糧，第三年就蓋新房了。當時最流行的話是：「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別小看這兩句話，萬、趙開明務實的做法，使他們成了農民心目中的救星。

有一次，萬里同志約我到他家裏談話，我好奇地問，您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任上，為甚麼會冒這麼大的政治風險，允許農民搞包產到戶？他沉思了一下說，我寧可要吃飽肚子的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的社會主義。這話撞在心頭，擲地有聲，令我頓生敬意：這人是真共產黨！甚麼是真共產黨？就是說真話，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

時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的杜潤生，是農村改革的推動者，也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面對黨內各級官員的紛紜爭論，他提出兩個觀點，一個叫「責任制」，責任制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屬性，是個中性詞，各行各業都應有責任制，農民包產到戶、包乾到戶也是社會主義聯產計酬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另一個觀點叫「因地制宜」，可以由生產隊統一經營統一分配，可以包產到組，也可以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即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前一個觀點給包產到戶報上了「社會主義戶口」，讓農民放心；後一個觀點允許從實際情況出發，讓農民自主選擇。這一下子，包產到戶、包乾到戶不推自廣，星火燎原，風行全國，取代了人民公社經濟制度。

這麼大的一場變革，沒有搞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沒有派大批工作組下去硬性推廣，沒有鬥爭處分任何黨員幹部和群眾，和平地實現了轉變，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是個奇迹！農村責任制的實行，為黨重新贏得了幾億農民的心，贏得了他們發自內心的擁護，也為黨重新贏得了執政的資格，鞏固了執政的地位，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大標誌性事件，一個是開辦特區，由廣東的習仲勛、福建的項南率先搞起來；另一個是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實行，由安徽的萬里、四川的趙紫陽率先搞起來。這兩件事都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他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論點，由此奠定了一個新時代的理論基礎。

二 浪花激盪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也即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大批青年人活躍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他們不是決策者、領導者，多數不在體制內，不是黨員、官員，但這些年輕人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弄潮者、鼓動者和實踐者，在不同領域發聲，有一種縱身入激浪，千里競自由的氣勢。

這一代相當多的年輕人都有上山下鄉、農村插隊的經歷。之前，這些人不了解中國現實，聽到的多是宣傳，從萬花筒裏看世界，自認為是最幸福的

一代，立志要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獻身，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而奮鬥。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教育了這一代年輕人，他們在農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與宣傳截然不同的中國，也了解到農村的貧困和無奈、農民的疾苦和心願。宣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激發了他們尋求變化、變革的強烈衝動，自發地、自願地投身於改革開放的大潮。

有三個文革前的大學生，率先行動，影響很大。一個叫陳一諮，是北京大學畢業的，當過公社書記，在鄧力群的支持下，在兩個老幹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耕今、北大經濟系副主任楊勛）的幫助下，匯集一批插隊回城的青年，組建了農村發展組，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用詳實的數據和實例，熱烈支持億萬農民的社會實踐，使得黨內高層對農村變革的非常激烈的爭論，在責任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上，認識逐步趨向了一致。這個發展組有很多優秀的青年：陳錫文、杜鷹、宋國青、周其仁、王小強、張木生、鄧英淘、楊冠三、謝揚、高山、孫方明等，都在其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心雄萬夫，盡顯才華。

另一個叫金觀濤，也是北大畢業的，從系統論、控制論的角度提出中國專制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的論斷。他和他的助手陳越光組織翻譯了一批優秀的國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類書籍，編輯出版名為「走向未來」的叢書，對當時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啟迪性、啟蒙性影響。

再一個叫溫元凱，是中國科技大學的畢業生，赴美留學回來，任副教授，率先提出教育制度的改革，關注新技術革命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衝擊性影響。其對中央的書面建議被鄧小平肯定後，四處宣講報告，令人耳目一新，聽聞者再不敢夜郎自大，是謂書生吶喊，轟動一時。

年齡稍小一些的所謂「老三屆」中學生（即1966年的初中生、高中生），更為活躍。林春、李銀河兩個女青年，還有王小強、王曉魯，他們分別在報刊和內部文稿上寫了幾篇思想性很深刻的制度性批判文章，力透紙背，發人深省。一些務過工、務過農的青年人不約而同地匯聚在一起，或七八個人，或幾十上百人，暢議中國如何繼往開來，除舊立新。那是個生氣盎然、集思廣益的年代，王岐山、黃江南、朱嘉明也都活躍其中，我有幸結識了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切磋中國的現實和未來，組成了自稱為「康拜因」（聯合作業）的學習小組。

1980年秋天，時任總理的趙紫陽，看到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發的一篇我在內蒙調研時與幾個朋友關於中國百年復興的講話，於是在一個周六上午，約我去中南海談話。趙紫陽開門見山地問：你在這篇講話中說了一句，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戰略有問題，但沒有展開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戰略出了甚麼問題？我說，您是總理，總理就是大管家，國計民生、經濟建設處處要花錢。但經過文革，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到了極度困難的邊緣，您這個大管家管這麼多事情，兜裏卻沒錢，有限的錢和寶貴的資源用到甚麼地方去了呢？用到戰備、準備打仗上去了。為甚麼呢？因為毛澤東定過一個基

調：時代的特徵是戰爭與革命，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我說，這個判斷今天已不適用了，現在沒有爆發戰爭的緊迫性，至少在未來二十年中國沒有面臨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跟美國跟蘇聯，這兩場戰爭都打不起來。我詳細分析了不存在這兩場戰爭的可能性，如果戰爭不會發生，那麼就應該裁減軍隊、軍備、軍費，把錢省下來用到經濟建設上去。

我們從上午9點談到中午12點，秘書進來說下午1點半還有外賓要會見。總理說，今天就談到這裏，我們還沒有談完，下禮拜一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我們接着談，談國民經濟的問題。我說，我和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問題，起個名字叫「康拜因」，就是聯合作業的意思，我能不能請他們一起來談？趙說可以。

下周一下午，我們幾個年輕人進了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長桌對面都是高級別的領導同志。趙紫陽說：這個會議室從來沒有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進來過，今天我們來聽聽幾個年輕人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意見和建議。那天會議從下午2點開到晚上7點，我們講的主題是不贊成中央當時定的國民經濟要大發展的基調，而是主張在國民經濟存在結構性危機的極度困難時期，至少應有一兩年恢復元氣的調整階段。年輕人講完，領導們提問，繼而討論，既很熱烈也心平氣和。從那以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姚依林等領導同志多次找我或康拜因小組或其他年輕人到辦公室或家裏談話，帶年輕人外出考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這說明，當時整個社會從高層到底層都在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和方向，這些高層領導具有很強的開放意識、前瞻意識、學習意識、包容意識和「接地氣」意識。這很了不起，極其難能可貴。

有一次，農村發展組在中南海勤政殿向總書記胡耀邦匯報關於糧食徵購指標的研究報告，認為以往對農村較高的徵購指標可以降下來，每年徵購1,200億斤糧食即可基本滿足城市和工業需要，這有利於農村市場的活躍和多種經營的發展。胡耀邦說乾脆去掉零頭，就徵1,000億斤。這時有個青年衝着他喊：你胡說甚麼呀！有根據嗎？我們提出的1,200億斤這個數字是經過嚴密測算和反覆論證的。此情此景，發生在歷朝歷代至少也屬於「大不敬」吧，任何人聽了心裏也會動氣，胡耀邦也是人，不高興也很正常。但他居然站起來，走到這個青年人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說，你慢慢講，我細細聽。總是說共產黨人要有胸懷氣度、虛己納諫，書本上看到過，生活中沒見過。甚麼是？這就是！

很多人聽說過杜潤生，聽說過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辦公地點「九號院」這個別稱，聽說過那裏連續出台過關於農業、農村、農民政策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聽說過九號院裏生動活潑、民主自由的研究生態，聽說過那裏年輕人嶄露頭角、縱論國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趣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作為中共中央的中樞幕僚機構，竟然有「三允許」：允許你的研究課題和黨的文件規定的重點不一致；允許你的研究結論和黨的文件精神不一致；允許你的研究成果不被中央採納後保留個人意見。年輕時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印

象最深的兩句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批判；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當時能想像，不真懂；進了九號院，聽到「三允許」，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這才是真自信！

執政者多喜歡尋求一致，要求保持一致。這很正常，但做法不同，效果相反。高壓威懾、強求表面一致，其實各人內心想法不同，這種一致是靠不住的；允許各種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在這個基礎上，尋求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識，這種一致是靠得住的。前一種一致要求各級官員成為傳話筒、錄音機、機器人，事業成了少數人的事；後一種一致能激發各級官員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事業成為多數人的宏大舞台。所以，杜潤生的做法了不起。

1984年，黃江南、朱嘉明、王岐山、李湘魯、張鋼等人籌辦發起了中青年經濟學者研討會，周其仁、華生等一百多名優秀青年學者匯聚浙江省莫干山。會議就價格體制改革提出了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前者漸弱漸小，後者漸強漸大的主張，即著名的「雙軌制」，受到時任國務委員、國務院價格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張勁夫的重視，親自聽取匯報，由此演變成為中央實行的政策。這次會議被譽為中青年學者在經濟改革領域的集體發聲，影響久遠。

關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年輕人，四十年來，各種回憶錄、雜誌、報紙、視頻，對上述諸方面，多多少少都有報導，但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一些農村插隊回城上學、工作的青年人，又一竿子直插到縣一級工作，在基層第一線實踐改革開放的理念。率先下去的，有劉源（劉少奇的兒子），到河南省新鄉縣當副縣長；有習近平（習仲勛的兒子），到河北正定縣當縣委副書記；有萬季飛（萬里的兒子），去了山西；有薄熙來（薄一波的兒子），去了遼寧；有鄭京生（原北京市委書記鄭天翔的兒子），到北京郊區的公社當副書記。他們下去，生活簡樸、聯繫群眾、發展經濟、探索改革，在那裏都幹得挺有聲色。

劉源能吃苦，愛學習，人正派，肯鑽研，熱心給群眾辦事，上下左右口碑很好，後來當了鄭州市副市長。不久，河南省開人民代表大會，選省長、副省長，不在候選人名單上的劉源竟然高票當選副省長，報到中央，回覆：人大選的，民意民心，認賬！這年，劉源三十七歲。

習近平到正定，摸清脈絡後，幹了幾件實事。第一件事是核減糧食徵購指標，既讓農民吃飽了肚子，也有了種棉花和經濟作物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讓肚皮子和錢袋子鼓起來了，此舉大得民心。第二件事是在正定這個學大寨先進縣，幹部對包產到戶普遍懷揣「省裏沒文件、地委沒表態，我們等等看」心思的地方，先在最窮的地方試行符合農民心思和意願的生產責任制，讓增產增收、農民歡迎的事實說服各級幹部，各種阻力應然而消。方法對頭，事半功倍。第三件事就是有前瞻意識，正定毗鄰石家莊，縣裏制訂了〈從實際出發，積極探索有正定特色的「半城郊型」經濟發展道路方案〉，引導農民打破行政區劃、城鄉界限，去叩城市市場的大門，城市需要甚麼，就種甚麼，加工甚麼，不僅提供產品，也提供勞務。杜潤生鼓勵青

年人，別人看到了的，你要看得遠一些；別人想到了的，你要想得深一些。習近平做到了。第四件事是習近平聽說中央電視台拍《紅樓夢》要建臨時外景場地，他除免費提供場地外，力主將榮國府臨建外景建成永久建築。三百多萬元的這項支出佔當時縣裏一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風險不小，責任很大，習近平四處告幫籌款，終於落實。誰也沒料到，一年半就從門票收回了投資成本，旅遊也成了正定縣的新興支柱產業。那個年代，縣市級幹部正致力於解決溫飽問題，很少有人動過發展旅遊業這個念頭，習近平想到了，也幹成了。1983年10月，習近平接任正定縣縣委書記，那年他三十歲，是那個年代中國最年輕的縣委書記。

杜潤生關心這些到第一線工作的年輕人，曾派專人數次給習近平送文件材料，讓他更多了解宏觀動態，同時將劉源、習近平、萬季飛這些人聘為中央農研室的特約研究員，不定期地請他們到九號院座談，參加中央文件起草過程中的討論，聽取來自基層一線的年輕人的看法和意見。

三 溫故知新

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年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中國改革開放時意氣風發的場面，依然歷歷在目，仿如昨天。他們的思考、做法、作風和實踐，在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有哪些值得參考和借鑒呢？

第一條，倡導解放思想。任何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必然伴隨一場思想激盪的解放。除非現實一切完好完美，無需再變，否則對現行制度、規定和做法中不合理之處的任何「妄議」、「妄為」，都是改革本身的題中應有之義。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相對於過去時代，無異於離經叛道。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年輕人的發聲，都屬於違背當時中央規定的妄議；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屬於違背當時中央決議的妄為；萬里、趙紫陽在省委書記任上對農民探索行為的支持，就不僅是妄議，也兼有妄為了。毛澤東曾樹過一個好榜樣，他敢於妄議共產國際關於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指示，反對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下去攻打長沙，提出中國革命是農民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曾一度受到打擊排擠。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甚麼是思想解放？定義很多，但陳雲講得最樸實、通俗、簡潔：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第二條，注重調查研究。現行制度下，高級領導人獲取信息的渠道無外乎親隨、秘書、文件、簡報、會議。下去視察，前呼後擁，看到的也多是經過排練、有成套應對台詞的場景布置，聽到真話、看到真情不易；而信息經過每一次傳遞和折射，都會帶來真實度的衰減和扭曲，依據不實數據、匯報或憑主觀臆想來制訂政策是極其危險的。中國當年改革開放的做法，一開始都是下面提出來、幹起來的，中央經過系統調查、充分論證，總結了基層群

眾和一線幹部的經驗、智慧和創造，而後才出台相應文件予以肯定和推廣。這種文件，符合實際，能夠操作，也得民心官心。

一項重要的政策，任何贊成意見中必會有瑕疵的成份，任何反對意見中也必會有合理的成份；聰明的決策者一定會鼓勵反方向推敲，讓反對意見充分發表出來；各種分力作用下的合力線方向，就是政策制訂的依據。此外，職務的高低與對真理的把握並不成正比，決策的危險時刻常發生於：高級官員面對自己相對陌生或並無深入研究的政策討論時，往往不經意間會發表些自以為懂得、實際上並不真懂的「深刻」意見。

第三條，鼓勵實事求是。共產黨歷來強調實事求是，但很難真正做到。官場語言和文字的腐敗，就是國家政治生態的腐敗。不少官員講假話不講真話，講鬼話不講人話，把講政治衍化為說政治、唱政治，公然挑戰常識、公理、規律和人性，卻屢屢受到重用，這個示範效應後果惡劣，前車之鑒慘痛，尤當引以為戒。

把中國地形圖和世界地形圖放在一起對照，會發現中國地理是世界地理的濃縮版，江河湖海、高原丘陵、沙漠戈壁、山地平原無一不有，劃一治國的局限性、片面性很大。一份中央文件難以指導東西南北差異性很大的中國，只能放出空間，讓各地官員因地制宜，分類施治。1947年，中央下發過一份關於解放區土地改革四十條的文件，毛澤東在文件上加了段批語，大意是地方上的幹部，若要反對這份中央文件，最好的辦法就是原封不動，照搬實施。毛澤東悟透世事，洞若觀火。

第四條，不拘一格用人才。開創新時代，實施新戰略，要有人幹活兒。出台文件僅僅是第一步，落實文件要花大氣力，要有一大批有能力、有見解、有分寸、有擔當的幹部衝鋒陷陣。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因素。

解決幹部問題，主要靠兩條：一條是五湖四海，改革開放不是少數人的事，是多數人的事，是全中國的事，要靠大家來幹，沒有群英匯，難創新局面；八千九百萬黨員中，人才濟濟，十四億中國人中，賢達備至。去掉偏見，幹部就在眼前。另一條是重視青年，青年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總活躍在時代浪頭的前沿。這個世界上，領導和管理通常是滯後於生活實踐的，但青年人卻走在前面。聽取青年人的意見就是面向未來，發揮青年人的作用就是希望所在。

翁永曦 1948年生。受過高中教育，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曾於內蒙農村插隊八年。1979至1984年在國家農業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並於安徽省鳳陽縣、嘉山縣掛職。1984年底經批准停薪留職，下海創業。喜歡讀書，交遊廣泛，關注國情與國際問題研究。